

# 试论抗战时期四川物价管制的实施

曹发军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抗战时期,四川省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在全省实施了物价管制。四川的物价管制实施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协议评价时期、平价购销时期、以粮控价时期和全面限价时期。四川物价管制未能控制住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前中国生产力落后且现代工业分布不平衡;抗战爆发后工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的陷落使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商家惜售,囤积居奇的现象屡禁不绝。

**关键词:**四川;物价;管制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190-06

抗战爆发后,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国民政府采取了近代国家战时常用的有利于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支持战争的经济统制政策。物价管制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战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国民政府的物价管制,近年学界研究颇多<sup>①</sup>,但研究的视角多倾向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层面,对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则缺少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物价管制政策在大后方的中心四川省的实施情况作一些简单探讨,藉抛砖引玉之功效,以求对此类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

物价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物价的剧烈波动往往是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的集中表现。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卢沟桥事变,随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也沦落敌手。随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因此而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改变了四川的政治、经济生态,从而引发作为经济风向标的物价的波动。战争的前四年处于四川中心地带的重庆、成都两市物价情况如表1所示:

## 一、抗战爆发后四川的物价状况

表1 1937-1939年重庆、成都两地趸售物价指数

	总指数		粮食类		衣着类		燃料类		金属类	
	成都	重庆	成都	重庆	成都	重庆	成都	重庆	成都	重庆
1937年	101	103	97	98	108	108	103	99	108	105
1938年	126	128	89	95	181	162	148	104	201	142
1939年	220	225	122	113	462	348	310	194	414	376
1940年	559	665	317	395	1154	1000	1024	766	955	1398

注:①民国26年上半年=100;②公式:简单几何平均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编《中国抗战时期物价史料汇编》1998年版第287-305页

据刘长宁指出,抗战期间四川物价“总指数自止,仅有两个月表示下落”,“在战时初期以衣着类为一直上涨,自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涨势为剧,后期则以粮食涨势为甚”<sup>[1]77-78</sup>。此论指

① 贾秀岩著《民国价格史》和周春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物价管制都有专门论述。

收稿日期:2008-05-20

作者简介:曹发军(1968-),河南信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州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

整个抗战时期物价变动情况,但在抗战爆发后最初的两年,四川物价只呈现温和上涨。1937年,“川省丰收”<sup>[2]112</sup>,四川粮食价格较战前有所降低,从外埠进口的衣着类和金属类商品价格微涨,但由于粮价下降,部分地抑制了物价的整体上涨。到了1938年,四川物价(粮食除外)已经开始上涨,但物价整体水平上涨幅度不大。究其原因,主要在四川地处内陆,战争对四川经济的影响还没显现,且四川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工商业落后,民众收入普遍较低,对各类商品的需求不旺。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战争对四川物价的影响逐渐凸显出来。1939年,四川物价上涨步伐明显加快,不仅衣着类、金属类、燃料类商品价格上了一个新台阶,粮食价格也开始出现上涨的苗头,但涨势仍然不很剧烈。及至1940年,四川各类物价开始加速并呈现全线上涨态势。造成此状况的原因,具体有如下几点:一是这年四川“秋收荒歉”,收成不能满足需要;二是“宜昌失守,长江南北粮运梗阻”;三是“欧战扩大后,上海、香港大批游资复流入后方从事土地投机和粮食囤积,致价格飞涨”。这些因素导致粮价上涨的“猛烈程度凌驾于一般物价之上”<sup>[2]112</sup>,带动了整个物价指数的上涨。正如时人所言:“自二十九年七月以后,总指数大体可谓随粮食类上涨而上涨。”<sup>[2]169</sup>据统计,1940年的物价已是1937年的数倍,尤其是从外埠进口的金属类、衣着类物品价格更达到1937年的十几倍之多。四川物价指数从此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趸售物价指数为513<sup>[3]289</sup>)而领涨全国。到1941年6月,据中国农民银行的统计,全国各重要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依物价的高低次序排列,列最高为雅安,次之为成都,重庆,西安,洛阳,贵阳,西宁,兰州,郧阳,衡阳,枝林,曲江,赣州,上海等地。从物价最高的雅安的指数1652.5,到物价最低的上海的指数735.6,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达一倍以上”<sup>[4]3</sup>。四川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物价形势的严峻显现无遗。

物价的快速上涨,给四川经济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后果十分严重。首先,物价暴涨,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在物价暴涨的境况下,不仅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人和其他城市贫民生计艰难,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而且诸如“教育机关之教职员,地方团队之官兵及各机关公务员等”,“一般依固定收入维持生活者”,也由于“不能以原有之货币收入,购得其日常消费品之原有数量”,出现了“辛勤终日,而温饱犹不及给”<sup>[2]173</sup>的现象。其次,物价暴涨,加剧了社会矛盾。在农村,农民是以实物缴纳地租,地

主因此掌握了大量粮食。随着粮价暴涨,地主高价出售粮食,获得了大量货币财富,以至于越来越富裕;而农民则由于其生产的粮食在缴纳地租后仅够糊口,无以出售,随着其他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高涨,他们却愈来愈穷。这就使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在城市,随着物价上涨,贫民生计日益艰难,在饥饿的驱使下,抢米事件在省内频发。据蒋介石在发给贺国光的电报中说,仅1940年7月11日,“城厢之抢米案件,竟达四起之多”<sup>[2]288</sup>。抢米案件之频繁,可见一斑。第三,物价暴涨,影响了后方的生产。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随着工人工资上涨,企业成本亦随之增加,那些资金少,利润率低的企业,开始大量倒闭。有记载称,1940年,“米价涨到300元一旧石时,北碚一带的煤窑子不少关门的”<sup>[5]2</sup>。川省经济形势亦随之愈益恶化。第四,物价的暴涨严重影响了军粮的筹措和其他军用物资的购置,不利于支持抗战。

上述情形表明,物价的快速上涨恶化了川省的经济形势,严重影响了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稳定,对抗战大局构成很大威胁。川省严峻的物价形势,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物价管制政策。

## 二、物价管制政策的实施

整个抗战时期,为了平抑物价,四川省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为了便于考察四川的物价管制实施情况,笔者根据中央政府物价管制政策的变迁,把四川的物价管制实施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协议评价时期、平价购销时期、以粮控价时期、全面限价时期。

### (一)协议评价时期

1939年初,鉴于国统区物价日涨,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对物价实施管制。2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以下简称《办法》)<sup>[3]8</sup>,正式启动物价管制工作。《办法》对全国的物价管制做出部署和安排,要求“地方主管官署应会同当地有关机关或经营日用必需品的同业公会,设立平价委员会,办理当地日用必需品平价事宜”。4月1日,四川省政府以训令的形式向全省转发《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训令各县市成立平价委员会。为了推进平价工作的开展,7月10日,四川省政府向所属县市公布《平价委员会组织章程》和《平价委员会细则》<sup>[6]</sup>,具体指导平价委员会的组建工作。之后,川省内各县市平价委员会始开始成立。8月26

日,四川省会成都由市政府、市党部、警备部、省公安厅、市商会、税务局、京缎同业工会、油米同业工会、棉纱同业工会及有关同业工会组成以市长杨全宇为主任委员的平价委员会。到11月份,其他各县市平价委员会都基本建立起来。在督促指导各地建立平价委员会的同时,为了给平价委员会提供经费保障,省政府还规定“(1)成都、自贡两市,各月支经费三十元;(2)一等县各月支经费二十元;(3)二等县各月支经费十五元;(4)三等县各月支经费一十元”<sup>[7]</sup>。至此,四川省物价评定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根据《平价委员会组织章程》的规定,县市平价委员会的任务是:一、评定日用物品价格;二、取缔投机操纵奸商。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评定物价的机构建立了,法令也颁布了,但是物价评定工作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开展起来。大多数县市诚如彼时兼任省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所言:“对于平价委员会办理情形,素鲜稽核,而于指定评价之物品及价格,多任其随意填报,敷衍塞责。”<sup>[8]</sup>就是物价评定工作做得比较好的重庆、成都两市,表现也差强人意。在重庆,据寿进文当时的记载,“平价委员会平价的对象虽甚广泛,但实际上的对象仅猪肉、理发、浴资以及工资等数项”<sup>[4]35</sup>。在成都,由于评价委员与污吏奸商串通一起,甚至还出现评定的价格高出物价的奇怪现象。如“阴丹蓝布市价每尺18元(法币),评价为21元(法币),比市价约高17%”<sup>[9]36</sup>。由于包括四川在内的国统区各地没能很好地执行物价评定政策,物价评定“推动颇感棘手,而少数地方更因特别困难,未能充分实行”<sup>[3]15</sup>,物价管制只好改弦易辙。

## (二) 平价购销时期

由于前一时期的物价评定工作没有能够很好地开展,到了1939年底,全国的物价形势更加恶劣。为进一步平抑物价起见,国民政府加大了物价管制的力度。1939年12月5-6日,经济部公布《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平价法令之说明》<sup>[3]10-15</sup>等三个法令,对物价管制作出了新的部署。国民政府的物价管制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物价管制政策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打击囤积居奇;二是推行平价购销。国民政府的意图在于通过打击囤积居奇和推行平价购销的方式达到平抑物价之目的。为了落实中央的政策,有效实施物价管制,四川省政府于经济部的三个法令颁布后不久就颁布了《四川省各级机关办理平抑物价与党部联系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sup>[2]230-231</sup>,对川省的物价平抑工作作出具体的安排。《办法》规定,“关于全省平抑物价及购销事项,由四川省物价平准处主持办理”,在“物价平准处下附设物价评议委员会”专事“各市县平定价格之审定,平价变更时之评议,有关平价及推销事项之建议”。根据这项规定,1940年5月,四川省成立了直属于省政府的物价平准处。平准处成立后分别于1940年7月8日和8月5日,颁布《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管理囤积日用品暂行规则》<sup>[10]</sup>、《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管理各市县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管理各市县经纪行户规则》<sup>[11]</sup>三个法令,着手开展工作。由于1940年“入春以后”,四川的“粮食价格逐步狂涨”<sup>[12]</sup>。粮价的上涨不仅带动了整个物价指数的上涨,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和军粮供应,直接威胁到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稳定。因此,平准处成立后工作的重点就是平抑粮价。为平抑粮价,平准处着重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1)取缔囤积米粮。1940年5月份,平准处成立后不久就饬令各县市“调查登记民间存储谷米”<sup>[2]291</sup>。对居民的存粮除按照《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管理囤积日用品暂行规则》规定的每人储存米二石五斗的标准留下自用外,余则勒令平价出售。(2)实施平价购销。从1940年7月份起,平准处通过到周边各县采购、借用,对囤积户实施没收、对登记不实者实行减价收购等手段筹集食米,平价销售给市民或者米商。但是,平准处的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平准处的工作,乡绅陈紫舆、陈国栋等是这样看的:“自平准处成立以来,仓促平抑米粮价格,市场米粮来源断绝,致成供需不应之状态,兼以平准处平准米粮,供应不足,市民争购无米,炊断食废,怨声沸腾。”<sup>[2]299</sup>把市场上粮源断绝归结为平准处的工作,固然有失公允,但平准处没有能够平抑粮价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没有粮源,加之资金短缺,在内外交困下,平准处的工作“旋即停止”<sup>[9]36</sup>。

## (三) 以物控价时期

鉴于平价政策不能达到平抑物价之目的,国民政府开始以控制粮食等重要物资的办法来控制物价。1940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全国粮食局,统一筹划粮食的产销储运。之后,各省粮食局先后成立,各县市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由于川省粮食问题严重,为加强粮食管制起见,除了在省、县市设立粮食管理机构外,川省还在各地最大粮食市场都设有办事处,在各镇公所经济文化股下增设粮食干事一人。然而机构的建立没有能缓解粮价上涨的压

力。1941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以严厉的措施来管理粮食,但粮价依然飞涨。为了控制日益高涨的粮价,不久国民政府决定施行田赋征实的政策。田赋改征实物,最早是在山西实行起来,后来福建等省效仿。由于实行田赋征实能有效解决军粮民食的筹集问题,还能极大缓解粮价上涨的压力,故经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提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先后通过田赋征实的决议。7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成立粮食部。23日,行政院公布《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sup>[13]176</sup>,咨令各省施行。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财政部四川田赋管理处”于8月1日成立,接着各县田赋管理处也于9月1日全部成立。9月16日,四川全省开始征收实物田赋,“到同年12月止,全川完成的征购总数已达1100余万市担,占规定川省征购总数的90%以上。截至1942年2月底止,川省是年度实收总数为1300多万市担,超过原计划(1200万市担)的11%,为全国第一,受到财政部的表彰”<sup>[14]269-270</sup>。为了掌握更多的粮食,粮食部规定除田赋征实外,各省还要用征购的办法筹集粮食。由于资金缺乏,1942年四川省改粮食征购为征借,不搭付现金,完全用麦、谷为本位的粮食券。1944年又改为征借。整个抗战期间,四川是田赋征实实施最好的省份,通过征实、征购、征借共缴纳粮食8426万市石<sup>[15]77</sup>。

田赋征实政策实施之后,为掌握更多的物资,财政部于1942年5月先后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条例》、《战时火柴专卖条例》、《战时盐专卖条例》、《战时食糖专卖条例》<sup>[13]112-124</sup>等几个法令,宣布对盐、糖、火柴、烟类四项物品施行专卖制度。随后,川康区盐、食糖、火柴、烟专卖局分别成立。专卖制度的运作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专卖品的生产和销售遵循“(1)民产;(2)民制或官制;(3)官收;(4)商运;(5)商销”<sup>[13]106</sup>的原则,二是专卖品的定价采用核价政策,按照生产成本来确定其价格。政府实施专卖制度的初衷在于企图通过掌握物资,核定商品价格来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专卖制度一直持续到1944年。

#### (四)全面限价时期

因“各地物价波动,越出常规,相激相荡,竞涨竞高”,“为图标本兼治之计”<sup>[16]</sup>,国民政府参政会及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加强物价管制方案》<sup>[17]113-117</sup>并由行政院于1942年12月2日公布。随后行政院兼任院长蒋介石电令各省市府“对于所辖区域内重要市场之物价、运价、工资,应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实行限价”,执行《加强物价管制方

案》所规定的“实施限价、掌握物质、增进生产、节约消费、便利运输、严密组织、管制金融、紧缩预算、调整税法、宽等费用”<sup>[16]</sup>的方针,战时物价管制进入全面限价时期。为实施全面限价政策,四川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根据《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精神颁布了《四川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工商团体部分实施办法暂行细则》、《四川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粮食部分实施办法暂行细则》、《四川加强物价管制方案日用品必需品部分实施办法》和《四川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工资部分实施办法》<sup>[3]167-179</sup>等法令,分门别类地提出了具体的物价管制措施;二是设四川省管制物价联合办事处。1944年元月,又把物价管制联合办事处改组为四川省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主席兼任,各厅厅长任委员,全面负责川省的物价管制工作;三是颁布《市县物价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sup>[2]239</sup>,要求各市县一律组织评价委员会,具体实施“指定管制物品限价价格之调查、协议事项”以及“日用品必需品之调查、调剂、供需事项”。

全面限价工作开始后,1943年5月,川省根据中央的要求于物价、运价、工资等项外把房租、地租也列入限价范围<sup>[2]272</sup>。到12月21日,四川省政府颁布《各县市不动产评价实施办法》<sup>[2]273</sup>,开始对土地实施限价。这以后,为了配合限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四川省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相关措施。例如,1943年1月,四川省政府颁发《收购物质搭附储券实施标准》<sup>[2]273</sup>,规定商号收购棉花、棉纱、盐、火柴、糖、茶叶等物资,要依据一定的比例领取储券;1944年9月,省政府倡导全省公职人员实行节约储蓄,等等。

除了运用行政手段以外,为实现物价的平稳,在全面实施限价的过程中,川省政府还对部分物品之价格实施补贴;在重庆大量抛售美金储蓄卷、公债;在全省运用黄金政策以吸收法币,紧缩信用等等,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手段对物价实施干预。

### 三、四川省物价管制的效果及原因分析

抗战时期,四川省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抑物价。战时,由于军政机构和工矿企业的迁入,四川成了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之所在,是前线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川省的物价管制是在特殊的抗战时期实行的应急措施,其意义远大于物价管制本身。首先,四川物价管制政策的实施对于遏制物价暴涨的势头,延缓大后方物价上涨的步伐,持续工农业生产,维持国民经济运转,保持后方的社会稳定,功不可没。1939年物价

急剧上升,四川省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部署下,联合商会、同业工会设立评价委员会,开展日用品价格评定工作,虽然评定标准不断调整、提高,但它毕竟使不断高涨的物价受到暂时抑制;1941年实行的田赋征实政策,使政府掌握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除供给军队、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外还有余额,余粮投放市场,对于安定社会,平抑粮价,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田赋征实政策实施后川省粮价趋于平稳。其次,物价管制政策保证了基本的军需民用,对支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物价管制是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与战时经济统制的其他措施,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战时经济统制的目的,国民政府能够苦捱到抗战结束而未出现经济崩溃局面,包括物价管制在内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在四川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但物价终究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稳定下来,物价是且控且涨。从1939年四川开始实施物价管制以来,四川各地的物价是一年一个台阶,有时甚至一个月一个台阶,涨势较同时期其他省份更为迅猛。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也承认:“本省对于物价管制工作,殊少成效。”<sup>[9]37</sup>

川省物价管制政策之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总的方面来说在于“物价管制工作属整个经济问题,非局部管制可能生效”<sup>[9]37</sup>。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是四川物价管制未能控制住物价的客观原因。抗战前,由于四川地处内陆,工商业相当落后,截止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可称为近代工业的工厂只有115个”<sup>[14]237</sup>,而相邻的周边省区工商业也不发达,这种状况决定四川所需的工业品绝大部分要依靠从沿海地区输入。抗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恶化,中国工商业发达的沿海各地相继沦陷。因日本“采取了水陆双管齐下、割断中国内地的战略”<sup>[18]</sup>,1938年10月,南京、武汉沦陷后,长江航运几近中断,后方所需进口物资之来源基本断绝,内地物资供应骤然紧张。

第二,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大后方和根据地,国民政府又迁重庆办公,工矿企业也大量内迁,大批军、政、工、商人员和难民源源不断地入川,四川人口激增。“抗战中,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类机关约57个,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约5000人;迁川工矿企业约700家,工人约1万多人;迁川高等学校48所,师生约2万多人;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仅1938年7月,长江中

下游进川到重庆入户达41900人。重庆1936年只有33万人,到1945年增加到125万人,8年抗战净增92万人。”<sup>[14]24</sup>据统计,重庆之外的四川省其他地方,1938年,有人口46349257人,到1944年增加到47509587人,人口净增1160230人<sup>[19]590</sup>。人口的激增,带来了大量的货币,形成了庞大的军需民用需求,加剧了四川物质供应紧张的局面,导致供求失衡,这也是抗战期间四川物价暴涨、物价管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第三,国民政府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严重。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工商业、农业较为发达的华北地区、沿海沿江重要城市、东南富庶地区的陷落,国民政府关、盐、统三税收入大大减少,造成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军费开支却大幅上涨,国民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具体数字如下表所示:

1937年-1941年中国政府收入、支出及亏缺额  
(单位:百万元法币)

时期	收入额	支出额	亏缺(盈余)额
1936-1937年	1972	1894	(78)
1937-1938年	815	2091	1276
1938年	315	1168	854
1939年	740	2797	740
1940年	1325	5288	3963
1941年	1310	10003	8693

说明:(1)资料来源:张公权著:《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20页;(2)1938年的数字系7月至12月半年的数字。

为了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大量增发法币,向银行巨额借款,并于1942年4月,普遍发行“关金券”,以“一关金”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投入流通,作为纸币的一种大量印发,与法币并行流通于市,从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四,物价上涨本身也是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原因。在预期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商家惜售,囤积居奇的现象屡禁不绝。奸商们囤积居奇,其目的在于待价上涨,而后抛售坐收巨利,“如江北县舒家场周国昌一年内购囤麦子120市石,江津县白沙镇绅士古明顺两个月就购囤食谷490市石”<sup>[20]100</sup>。而普通民众在物价上涨的预期下囤积物品更是常态,如1940年旱灾,粮食歉收,不仅市民,甚至各个公教部门都积极参与抢购,囤积粮食等重要日用商品。市民抢购虽然与囤积居奇有别,他们主要不是为图利,而是恐日后价格上涨,预购先买,以供他日消费,免遭高价购买之损失。但是,这种恐慌心理,加大了市场压力,加剧了供需矛盾。与抢购风盛行的

同时,一些官吏为谋取暴利不惜以身试法参与囤积时有发生。如“前成都市市长杨全宇,于1940年9月,勾结大川银行渝分行经理欧书元、合川万福发银行经理李渝臣,冒用福民面粉厂名义,购囤小麦达数百石之多”<sup>[21]</sup><sup>135</sup>。奸商、贪官污吏的囤积居奇,以及市民和各个单位的抢购囤积,造成流通于市场的商品大量减少,对于物价的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刘长宁. 物价统制论[M]. 重庆:财政评论社出版,1943.
- [2] 李竹溪等编. 近代四川物价史料[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 [3] 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研究所编.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 [4] 寿进文.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问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5] 陈正谟. 米谷生产成本调查及川粮管理问题[M]. 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41.
- [6] 四川省政府建一字号第一四三一〇号训令[Z]. 北川县档案馆档案旧档:第18全宗,第319卷.
- [7] 四川省政府建一字号第九四五号训令[Z]. 北川县档案馆档案旧档:第18全宗,第319卷.
- [8] 四川省政府建一字号第七九一七号训令[Z]. 北川县档案馆档案旧档:第18全宗,第305卷.

- [9]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物价志》[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
- [10] 四川省档案馆档案:41全宗,第3068卷.
- [11] 四川省档案馆档案:153全宗,第608卷.
- [12] 四川省政府平秘字第一四四六号训令[Z]. 北川县档案馆,第18全宗,第319卷.
-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4] 温贤美. 四川通史(第七册)[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 [15] 四川统计处编印:民国三十五年度《四川统计年鉴》(第二册)[Z],1946.
- [16] 四川省政府第607次省务会议决议案正本[Z]. 四川省档案馆档案,第41全宗,第5104卷.
- [17] 重庆市档案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时期(上)[M]. 重庆:档案出版社,1992.
- [18] 张公权. 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1.
- [19] 四川省档案馆. 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M]. 成都:西南交大出版社,2005.
- [20] 陆大钺.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J]. 民国档案,1989(4).
- [21] 周开庆. 民国川事纪要[M]. 台北: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ce Manage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CAO Fa-j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Sichuan Authorities implemented the price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reques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ce manage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period of assessing price by the agreements; period of buying and selling with the cheap price; period of curbing price by cereals; period of limiting the price comprehensively. The causes that the prices management in Sichuan was not effective are as follows. Before the Resistance War, the productive force in China was backwar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odern industry was imbalanced. After the Resistance War broke out, as the coastal area where industry was highly developed fell off, the financial revenue of the Government reduced by a big margin. The businessmen didn't want to sell the merchandise and waited to sell at higher prices.

**Key words:** Sichuan; price; management